

The “Institutional Trap” of Economic Growth: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Empirical Test

Feng Xio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Hohai University, Changzhou, Jiangsu, 213022, China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institutional fairness and institutional stability, and using the empirical methods of ordinary OLS regression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the grouping test of 2015 cross-sectional data of 106 countries shows that after join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institutional fairness and institutional stability, the output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 post-developed countries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19.19% and 34.18%, respectively. On the other hand, developed countrie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by 11.44% and increased by 7.36%, respective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value,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the post-developed countries is revised from “reverse N curve” to “reverse U curve”, while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lways maintain the changing law of “W curve”. The above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 vicious circle between the three-dimensional attributes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 post-developed countries is the main reason why they are easy to fall into the “institutional trap”.

Keywords

institutional trap;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institutional fairness; institutional stability

Fund Project

Central University Business Fee Project (2018B23914) and National Study Abroad Fund (201806715029).

经济增长的“制度陷阱”：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

熊锋

河海大学企业管理学院，中国·江苏·常州 213022

摘要

通过构建制度有效性、制度公平性与制度稳定性三维一体的制度质量分析框架，并利用普通 OLS 回归及分位数回归的实证方法，对 106 个国家 2015 年截面数据的分组检验表明：加入制度公平性及制度稳定性考察后，后发展国家制度质量的产出效应分别显著降低了 19.19% 及 34.18%，而发达国家则分别显著降低了 11.44% 和提高了 7.36%；随着条件分布值的提升，后发展国家的分位数回归系数由“倒 N 型”修正为“倒 U 型”，而发达国家则始终维持“W 型”的变动规律。以上结论表明，后发展国家的制度质量三维属性之间的邪恶循环是造成其容易陷入“制度陷阱”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制度陷阱；制度有效性；制度公平性；制度稳定性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业务费项目（2018B23914）和国家留学基金资助（201806715029）。

1 引言

对制度质量的重要性予以持续关注在经济学研究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正如诺斯（1968）在分析 1600 年 -1850 年世界海洋运输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及其随后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所指出的那样，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乃至区位的自身渐进累计和自我增强的过程需要以制度质量的改善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降低为前提，所

以它也常被认为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更深层次的原因（Acemoglu et al., 2004）^[1]。从竞争的角度看，开放条件下国家之间的竞争，从长期来看乃是制度优劣竞争的结果，这又直观地反映为对各国治理水平的认可程度。无论国家之间的特性存在多大差距，随着对外开放和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它们都会努力地提升制度质量的水平从而形成“向上竞争”，以避免陷入比较劣势而遭受“去中心化”或“边缘化”威胁。因此，开

放经济条件下的制度质量优劣, 不仅仅是一个解释各国之间产出增长持续差异的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直观反映各国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政治问题^[2], 因此探讨如何优化制度安排、改善制度环境及提高制度质量, 不仅可以为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还有利于在当前复杂新形势下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陷阱及治理危机问题, 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3]。

本文中, 后发展国家指的是由于制度上的内部缺陷和经济上的对外依赖, 而较晚得到发展机会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 后发展国家由于身处早已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包围之中, 其面临的是自身“迟到的被动的现代化”(何艳玲, 1999)^[4], 其矛盾冲突出现的频率和强度都将远远超过发达国家, 从而在与发达国家的制度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不仅如此, 后发展国家的制度质量还表现出与其经济增长非同步发展的特性。如图1所示, 选取中国、巴西和印度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代表, 同时选取美国、日本和德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1996年-2015年后发展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28%, 而同时期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94%。尽管如此, 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未给后发展国家带来制度质量的同步快速增长。这一时期发达国家治理水平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15%, 而后发展国家仅为-0.21%。整体而言, 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制度质量差异并没有因为其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被“熨平”, 它在这里不是表现为趋同而是趋异了, “制度陷阱”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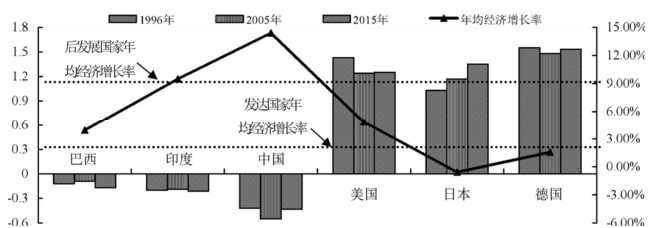


图1 制度质量与长期经济增长 (1996-2015)

说明: 左坐标为制度质量, 采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来衡量, 数据取其六项指标的算术平均值, 右坐标为年均经济增长率, 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stat 数据库并经计算而得。

“制度陷阱”问题的出现, 表明了后发展国家的制度质量改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效率更新为核心、以帕累托改进为动力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认为, 制度质量的分析框架至

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即制度有效性、制度公平性与制度稳定性。制度有效性、制度公平性、制度稳定性既相互独立, 但同时也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具体而言, 不同类型的国家, 或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三维属性的重要性各有不同, 忽视任何一方都是极其危险的, 这就需要从整体上对制度质量的三维属性进行把握。出于以上考虑, 本文设计了一个融制度有效性、制度公平性及制度稳定性三维于一体的制度质量分析框架, 并利用106个国家(其中后发展国家71个, 发达国家35个)2015年的截面数据, 对以上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 验证该分析框架的合理性, 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2 理论假说

2.1 制度有效性

对制度有效性的讨论是贯穿制度经济学分析的一条主线。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 出现“制度质量困境”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未能迅速地对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做出反应, 可将其概括为“制度供给不足”。作为制度的主要供给者, 制度质量的高低直接体现于其在制度供给及制度创新等方面的有效性。如果有效性的改善发生了停滞, 科研及技术创新活动就失去了生活的土壤, 更先进的生产力从而也不会诞生, 这种状况持续到最后就会拖累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从制度有效性的角度来看, 制度质量促进经济增长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第一, 它促进了劳动分工的广化和深化, 进而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6]。杨小凯(1998)指出“市场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的最重要的两难冲突是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 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会产生“经济起飞现象”; 第二, 它提供了完善的产权制度安排, 避免了“搭便车”、“公用地的悲剧”等问题造成的福利损失。著名的“科斯定理”明确指出, 产权的界定和权力的初始分配是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原因; 第三, 它本身乃是合理的权力分配的体现, 是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产物。只有通过制度对权力进行合理而有效的分配, 在不同权力关系中形成相互制衡关系, 才能保障个人、组织、国家乃至世界的健康发展。

2.2 制度公平性

公平性的重要性常常会被忽视, 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又往往难以承受。与柏拉图类似, 我们可以将公平划分为三个

层次：个人公平、制度公平与社会公平。从个人的角度看，如果制度公平无法保障，人们就会失去其相互交往的基础。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制度本身虽然不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目标，但发展和进步的结果必然要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公平的实现是以制度公平为基础的经济、政治、伦理等领域的有机统一。所以，制度公平既是个人公平、社会公平的基础，又是个人公平、社会公平的保障。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有其既定的社会因素约束，制度有效性和制度公平性是制度质量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片面追求制度有效性只会造成更多的“制度飞地”，只会为经济增长增加更多的障碍甚至是灾难。

进一步从制度公平性与制度有效性的相互关系来看，两者之间表现的是一种交互的、同向发展的关系。这是因为，制度有效性提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制度的不公平将会挫伤利益受损一方的积极性，进而破坏制度有效性提高的基础。反过来看，制度公平性需要以制度有效性为其物质前提，其自身必定要受到制度有效性条件的限制，过度的公平性要求往往都是不现实、也很难实现的。因此，两者虽是不同的范畴，但却共存于不同的层次之中。

2.3 制度稳定性

稳定性与有效性、公平性的主要区别在于，后两者对国家治理水平的改善是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调和的产物，其效果是显性的并为治理博弈的各方所享有的；而前者起到的则是一种间接的、长期作用，其后果往往是不为人所知的，其收益也不一定被治理博弈的各方所享有，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战略行为。在稳定性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制度相容”的程度被大大地降低了，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制度排斥”，更多的资源被消耗于“制度摩擦”而不是生产性活动之中，从而动摇政府和个人对制度改哪个的信心及预期。

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由于财政实力较弱、管理能力较差等原因而无法支付先期成本，加之无法预知新的制度均衡所能产生的具体变化，多会选择放弃前期改革的努力，任由较低水平的制度质量存在。最终这些国家不仅无法享受制度质量水平维持在高位所带来的全部好处，反而要承担有效性及公平性不断下降的治理成本。此时，较低水平的制度质量不断被“锁定”，“制度陷阱”问题也开始出现。而对于发

达国家而言，由于在资金、技术与管理能力上的优势，往往会继续推进制度变革，享受新一轮制度创新的收益。

2.4 制度质量三维属性分析框架

可将制度质量的三维属性，即制度有效性、制度公平性、制度稳定性，融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首先，制度有效性是制度质量的直接属性。制度效率可能会因为社会冲突的综合效应及承诺的缺失（或无效）而蒙受损失，制度变迁因而可能无法顺利进入“梯形”的上升演进通道，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其次，制度公平性是制度质量的社会属性。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有其既定的社会因素约束，制度的有效性和公平性是制度质量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再次，制度稳定性是制度质量的长期属性。实际的制度质量就是在各种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稳定——波动——再次稳定——再次波动”的动态演进，并最终达到制度均衡。

制度公平性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其对制度质量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甚至是存在于个人认知之外的。在大部分时候，制度公平性担当的是“无形的手”的角色，于是制度质量的主要维度就由制度有效性及制度稳定性组成。如图2所示，AB是一条可能的制度质量曲线，反映的是在现实制度之中制度有效性及制度稳定性的组合情况。当然，制度公平性迟早会对制度质量乃至制度变迁产生影响，只有在制度公平性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的制度变迁最终才可能发生。例如，制度质量平面AOB的变动范围只能在CD之间摆动，任何超出这一范围的制度变迁都将引起制度体系的崩溃。在所有可能的制度质量平面之中，存在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最优制度质量平面”及现实意义上的“次优制度质量平面”，制度变迁的方向就是要尽可能地向这两个平面靠拢，否则就会出现意料之外的制度消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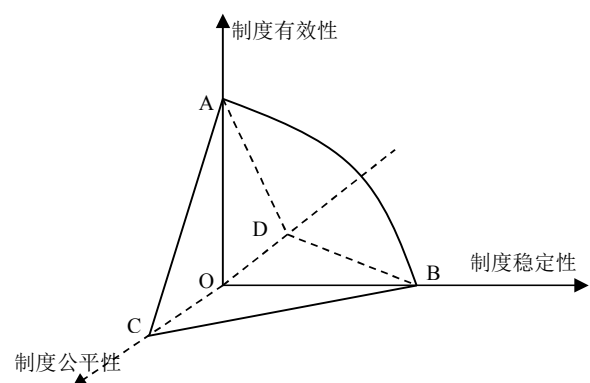


图2 制度质量的三维属性分析框架

3 实证验证

3.1 指标选取

采用定量指标的方法对制度质量进行测度和评价,在国内外研究中较为常见,但中国相关领域的量化研究还不多见。中国研究方面,公共治理指数主要针对中国各省市的比较,国家治理指数主要针对国际比较,且属于中国原创性领先研究,在指标选取上也充分考虑了后发展国家的特殊国情,故本文选取该指数进行验证。国家治理指数采用四级指标体系组成。其中一级指标有三个:“基础性指标”包含设施、秩序、服务三个二级指标;“价值性指标”包含公开、公平、公正三个二级指标;“持续性指标”则包含效率、环保、创新三个二级指标。从国家治理指数的构成与本文提出的制度质量三维属性分析框架的对应关系来看,可将“基础性指标”对应制度有效性,“价值性指标”对应制度公平性,“持续性指标”对应制度稳定性。

3.2 样本特征

对于哪些国家应属于后发展国家,现有研究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本文认为,区分后发展国家与先发展国家的关键点在于是否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以及是否能在国际交往中获得自我发展——那些融入全球化进程较早,属于国际规则制定者且能通过国际交往获得自主发展的国家可以归类为先发展国家;而那些融入全球化进程较晚,属于国际规则接受者且在内外交困局面下被动参与国际交往的边缘化国家可以归类为后发展国家。依据这个标准,除了G7国家及OECD国家等富人俱乐部之外的其他国家都可归类为后发展国家。本文最后选取了35个OECD国家作为发达国家样本,并选取了其他71个国家作为后发展国家样本进行考察,两者之间的对比如图3所示。不难发现,与G7国家及OECD国家相比,后发展国家在制度有效性、公平性及稳定性上均处于落后地位,其中尤其以制度稳定性表现出的“短板”最为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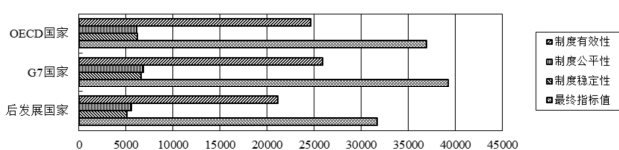


图3 国家治理的国际对比 (2015)

说明:数据来自于《国家治理指数报告2015》,取各类国家治理指数的平均值。

3.3 建立模型

借鉴Rodrik, Subramanian and Trebbi (2002)^[7]及郭苏文、黄汉民(2012)^[8]的实证方法,本文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子做全面分析,选取核心变量构建检验模型如下:

$$\ln RGDP_i = \alpha_1 T + \alpha_2 T^2 + \beta_1 \ln NGI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公式(1)中, $\ln RGDP$ 为人均GDP的对数, $\ln NGI$ 为国家治理指数的对数。T及T²为时间趋势项,其系数 α_1 及 α_2 用来考察经济增长随时间变动的趋势。 β_1 用来考察政府治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i=1,2,3, \dots, N$ 分别表示不同国家, ε_i 为随机扰动项。其中,制度质量的水平用国家治理指数来衡量,其数据来自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的《国家治理指数报告》。实证过程中将进一步分三种情况进行考察:情况一仅考虑制度有效性(IE),采用国家治理指数的“基础性指标”表示;情况二加入对公平性的考察(IEA),采用国家治理指数的“基础性指标”与“价值性指标”之和表示;情况三进一步加入对稳定性的考察(IEAS),采用国家治理指数的“基础性指标”、“价值性指标”与“持续性指标”之和表示。本文希望通过在三种不同情况下的对照实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3.4 数据检验

模型1采用普通OLS回归,这属于统计学意义上的“均值回归”。模型2采用分位数回归,其优点在于能够更加全面的描述被解释变量条件分布的全貌,这有助于更精确地描述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变动范围的影响,避免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在普通OLS回归中,情况三存在异方差情况,需要对原估计进行修正。本文采用原估计模型残差项绝对值的倒数为权重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调整后的结果如表1所示。在情况一的条件,制度质量每提高1%,经济增长同步提高5.94%;在情况二的条件下,制度质量每提高1%,经济增长同步提高4.80%;在情况三的条件下,制度质量每提高1%,经济增长同步提高3.91%。因此,相比较于仅考虑有效性的情况而言,加入对公平性及稳定性考察后,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分别显著降低了19.19%及34.18%。在分位数回归中,三种情况下的回归系数表现出与普通OLS回归系数相同的逐渐降低变动规律,但制度质量在不同分位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明显差异。在情况一的条件,随着

表 1 后发展国家截面数据的回归结果

模型 1: 普通 OLS 回归									
变量	情况一			情况二			情况三		
T	-0.04** (-2.44)			-0.06*** (-3.46)			-0.06*** (-12.03)		
T ²	6.45*10 ⁻⁴ *** (3.12)			7.34*10 ⁻⁴ *** (3.23)			7.09*10 ⁻⁴ ** (9.15)		
IE	5.94*** (6.95)			N/A			N/A		
IEA	N/A			4.80*** (5.32)			N/A		
IEAS	N/A			N/A			3.91*** (3.97)		
常数项	-50.48***			-39.73***			-31.14***		
R ²	0.629			0.551			0.922		
调整 R ²	0.612			0.531			0.918		
模型 2: 分位数回归									
分位点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情况一	7.02***	6.28***	6.06***	6.06***	6.09***	6.55***	6.69***	4.96**	2.18
情况二	3.01	2.37	3.79	4.84***	4.88***	5.06***	4.03**	3.14*	1.35
情况三	3.20	2.76	2.73	3.57	3.79**	3.99***	3.53**	2.64	1.69
样本数	71	71	71	71	71	71	71	71	71

注: 括号内的数值分别 t 检验值; ***, **, * 分别表示 1%、5% 及 10% 的显著水平。

条件分布由低值点向高值点转移, 分位数回归系数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然后又下降的“倒 N 型”变动趋势; 在情况二及情况三的条件下, 分位数回归系数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变动趋势, 此时的显著区间主要集中在 50% 到 60% 附近。

同理, 将发达国家的数据带入公式 (1) 中进行验算, 其普通 OLS 回归结果与后发展国家的对比如图 4 所示。在情况一的条件下, 制度质量每提高 1%, 经济增长同步提高 7.34%; 在情况二的条件下, 制度质量每提高 1%, 经济增长同步提高 6.50%; 在情况三的条件下, 制度质量每提高 1%, 经济增长同步提高 7.88%。可见, 发达国家的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在情况二的条件下仅比情况一下跌 11.44%, 这表明发达国家的公平性问题相比较而言更加乐观, 综合考虑效性和公平性不会带来太大的产出损失。而在情况三的条件下, 发达国家的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不但没有下降, 反而上升了 7.36%。这就印证了前文理论框架部分的论断, 即发达国家制度质量的有效性、公平性和稳定性三维属性之间是一种耦合共生的协调关系, 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发达国家进一步收益, 而后发展国家制度质量的三维属性之间则是相互制约和互相牵制的关系, 三者之间的“邪恶循环”最终只能造成制度质量产出效应的进一步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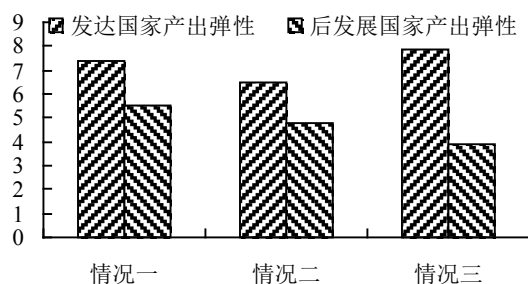


图 4 不同类别国家的普通 OLS 回归对比

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来看 (见图 5), 发达国家在情况一的条件下, 其分位数回归系数表现出与后发展国家不一致的“W 型”变动趋势, 且其分位数回归系数的振幅要明显高于后发展国家; 在情况二和情况三的条件下, 发达国家的分位数回归系数仍呈现为“W 型”的变动趋势, 且这一趋势在较低分位点和较高分位点 (大于 20% 小于 80%) 都是显著的。因此, 相比较于后发展国家, 发达国家制度质量产出效应的变动规律并不随着加入公平性和稳定性考察后而发生变化。此外, 发达国家在后两种情况下分位数回归系数的振幅和显著区间明显更长, 表明发达国家的制度质量无论是处于高值区间还是低值区间都具有较显著的产出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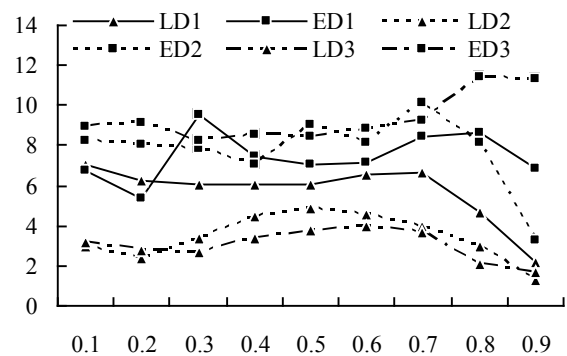


图 5 不同类别国家的分位数回归对比

注: LD1、LD2、LD3 分别表示后发展国家三种情况下的分位数回归系数, ED1、ED2、ED3 为发达国家三种情况下的分位数回归系数。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成果

第一, 仅考虑制度有效性时, 发达国家制度质量的产出

效应比后发展国家高。分组对比来看,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当其制度质量水平较低时,其制度质量的产出效应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当其制度质量处于中等或较高水平时,其制度质量的产出效应明显高于后发展国家。

第二,加入制度公平性考虑后,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制度质量产出效应都有所下降。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其分位数回归系数的变动趋势由“倒N型”修正为“倒U型”;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分位数回归系数的变动趋势维持为“W型”不变。

第三,进一步加入制度稳定性考虑后,后发展国家制度质量的产出效应开始下降,而发达国家制度质量的产出效应开始上升。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其分位数回归系数的变动趋势维持为“倒U型”;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分位数回归系数的变动趋势始终维持为“W型”。

综上,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所面临的制度质量问题有很大不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制度质量的三维属性表现为耦合共生的协调关系。换言之,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对更高的制度质量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更高的制度质量又有效地保障了其经济增长;而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其制度质量不仅在制度有效性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还进一步因为制度公平性、稳定性对制度有效性的制约和牵制作用,造成其制度质量长期在较低水平徘徊,以上三维属性之间的这种“邪恶循环”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制度质量困境”^[9]。

4.2 政策建议

第一,无论是处于较低还是较高的制度质量水平,通过改善制度有效性都能发挥出显著的产出效应。因此,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努力提高制度有效性都是贯穿改善制度质量的一条“红线”,要解决“制度质量困境”之类的问题必须以提高制度有效性为基础^[10]。

第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若忽视制度公平性的影响,其制度质量的产出效应都会被严重高估。因此,这两类国家都必须对不断蔓延的不公平和不平等问题施加足够的关注。考虑到公平性问题常隐藏了许多尖锐的收入分配和利益分割问题,若处理不当往往会造成社会的严重动荡和经济的长期衰退,所以必须要将制度公平性问题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第三,后发展国家制度稳定性较差,使其难以像发达国家那样享受新一轮制度创新的收益,这进一步削弱了其制度质量的产出效应。因此,后发展国家要在合理控制制度公平性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保障制度质量的持续积累过程来保证经济增长不至于衰竭,并使经济增长的抗冲击能力更强。

第四,在处理“制度质量困境”之类问题的时候,后发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性问题是要不断提高制度有效性,但后发展国家应同时更侧重于解决制度稳定性问题,而发达国家应同时更侧重于解决制度公平性问题。当然,随着制度质量的不断变化,应当重点关注的治理属性也会变化,其具体对应关系见表2:

表2 不同情况下应当重点关注的制度质量属性

发展层次	分位数	后发展国家	发达国家
较低水平	10%	有效性	有效性
	20%		1 有效性 2 公平性 3 稳定性
	30%		1 公平性 2 稳定性 3 有效性
中等水平	40%	1 公平性 2 有效性	1 公平性 2 有效性 3 稳定性
	50%	1 稳定性 2 公平性 3 有效性	1 有效性 2 稳定性 3 公平性
	60%		1 有效性 2 公平性 3 稳定性
较高水平	70%	1 公平性 2 有效性	1 有效性 2 稳定性 3 公平性
	80%		1 有效性 2 稳定性

注:表中的序号按重要性从大到小进行排序,越在前面的重要性越大。

参考文献

- [1] Acemoglu, D., Johnson, S. and J. Robinson,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2004, NBER Working Paper, No.10481.
- [2] 韩其恒,李俊青,刘鹏飞.要素重新配置型的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6(01).
- [3] 吕璐,张进军.制度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再思考[J].理论月刊,2017(06).
- [4] 何艳玲.“迟到的被动的现代化”——对后发展国家社会不稳定性原因的一点思考[J].学术探索,1999(1).
- [5] 张慧君.经济转型中的制度陷阱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09(04).

- [6] 邵军,徐康宁.制度质量、外资进入与增长效应:一个跨国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8(07).
- [7] Dani Rodrik & Arvind Subramanian & Francesco Trebbi, 2004. "Institutions Rule: 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Springer, vol. 9(2).
- [8] 郭苏文,黄汉民.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制度质量解释[J].统计与决策,2012(02).
- [9] 王泽填,卢二坡.制度、增长与收敛——一个基于索洛模型的分析框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02).
- [10] 陈丹丹,任保平.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质量:理论分析与计量检验[J].当代财经,2010(01).